

他者之镜：古伯察《中华帝国纪行》中的南昌府印象

吴雪

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，江西南昌，330013；

摘要：《中华帝国纪行》是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于19世纪环游中国后撰写的游记，在西方影响深远，为理解当时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提供了重要文本。南昌府是古伯察笔下印象尤为深刻的城市，他在书中对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方面作了细致记录。以古伯察在南昌府的行程路线为线索，从他者视角梳理古伯察所描绘的南昌形象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中折射的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。

关键词：古伯察；交通路线；南昌府；《中华帝国纪行》

DOI：10.64216/3104-9672.25.03.024

古伯察（Régis-Evariste Huc, 1813~1860年），法国传教士，汉学家，通晓汉、满、蒙、藏等多种语言。1844年，他与秦噶晔（Joseph Gabet, 1808~1853年）前往蒙古、西藏等地布教，后遭押解返回中国澳门地区。途中见闻著成《中华帝国纪行》一书，内容涵盖西藏、四川、湖北、江西等地，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诸多方面。该书出版后，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，欧洲主流期刊纷纷刊出书评，“古伯察首度发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”^[1]，甚至被一些传教士视为认识中国的“启蒙书”，足见其在19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构建中的重要影响。

南昌府是古伯察途经江西的重要一站。他在书中对南昌的城市风貌、交通网络、商业活动及风俗文化等作了细致描绘。本文通过梳理古伯察在赣的行旅轨迹，从他者视角分析其对南昌的观察与记述，以期进一步揭示19世纪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。

1 古伯察南昌之行的行旅路线

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间（1841~1846年），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及其教友完成了一次环中国之旅，其行程可分为两阶段：第一阶段为北上赴藏区传教，自以1841年2月由珠江北上，经江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内蒙古、宁夏、甘肃等地进入西藏；第二阶段自1846年3月从拉萨被押解南下，经四川、湖北、江西、广东，同年10月抵中国澳门地区返法^[2]。

在这次旅行中，古伯察曾两次途经南昌府。南昌自南唐升格为府，“辖7县1州：南昌、新建、丰城、进贤、奉新、靖安、武宁、宁州”^[3]。南昌府地处赣江流域水运枢纽，拥有通达的水系网络。尤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随着新通商口岸的开辟，导致货物运输流向的

变化，形成了“以九江为中枢的赣州—吉安—樟树—南昌—吴城—湖口—九江的基本框架”^[4]。古伯察自湖北抵鄱阳湖北端湖口，横渡鄱阳湖后，循赣江南下抵达南昌。

在南昌期间，古伯察受到知府与巡抚的礼遇，不仅获接见，还为其配备护卫与两艘平底帆船，沿途待遇优渥。此次南昌之行，不仅展现了晚清内河交通的网络特点，也折射出中西接触初期地方官员与民众对西方人的复杂态度。

2 古伯察眼中的南昌府印象

南昌府是古伯察一行人在江西停留的主要城市，优越的地理位置、发达的水路运输网络以及繁荣的商业贸易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古伯察眼中，南昌府是最著名的城市之一，“全中国最像样的一座城市”^[5]。

2.1 鄱阳湖：水运航道的枢纽、名副其实的“内海”

鄱阳湖位于江西北部，南纳赣江、抚河、信江等多条河流，北经湖口注入长江“形成一个完整的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成扇骨状分布的水系”^[6]，是江西水运网络的枢纽。古伯察一行自湖北沿长江航行至湖口进入鄱阳湖。他将湖泊形容为“它的北端犹如一条长舌伸出来与扬子江相遇”^[5]，并在横渡时感叹水面浩瀚如海：“为期两天的航行中，我们基本望不见陆地……分明是海洋，而非湖泊”^[5]称其为名副其实的“内海”。从湖口前往南昌有水陆两路，横渡鄱阳湖后经赣江即可直达南昌城。古伯察在书中写道，“我们本可以坐船直达江西省城的，因为驶离鄱阳湖之后，就进入到一条江口，它能直抵南昌城下”^[5]，由此可推断他们选择了走鄱阳湖——赣江航道到南昌这条便捷的水路。

此外，古伯察对当时鄱阳湖上千帆浪击的航运景象

更是大加赞美，“数不清的舟楫在鄱阳湖上破浪扬帆，百舸争流”^[5]。这一景象与清代鄱阳湖的航运地位相符，作为漕运、客货与商贸运输的核心通道，鄱阳湖串联起。“汉口—吴城—樟树—赣州—大庾岭—广东”^[6]的南北商路，承载巨大运输量，因而呈现出千帆竞发、舟楫不绝的壮观场面。

2.2 街道整洁、商贸繁盛的城市印象

在行经中国多座城镇后，古伯察常批评其街道狭窄、脏乱拥挤，但对南昌府却赞誉有加。用“干净宽敞”来表达自己的直观感受。这背后与明清时期南昌棋盘式的规整布局有关，此期街道的整体结构呈现出棋盘式格局，大街疏阔、小巷有序，整体呈现出整洁而通达的城市面貌。

此外，古伯察也注意到城内商业的繁盛。“店铺与货栈排列整齐，装潢气派”^[5]，并指出这种繁荣与南昌优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。“所有南来北往的货物都得经过南昌府”^[5]。对外，南昌北接鄱阳湖与长江，南通赣江一大庾岭—广东；对内，“传统的商路以赣江—鄱阳湖为主径”^[5]，形成贯通省内外的水运网络。完善的交通条件有效促进了商品流通与商业集聚，使南昌成为江西乃至南北贸易中的重要枢纽。在古伯察笔下，整洁的街道与繁华的市集共同构成南昌“最像样的城市”形象，也反映出交通布局与商业活动在城市发展中的紧密关联。

2.3 舒适奢华的水上帆船之旅

古伯察一行人进入江西后主要依靠水路乘船行进。赣鄱地区的造船业历史悠久，“明至清前期，江西的造船业随着漕运和商货运输的更加繁盛”^[9]，这一时期的船只船型多样、属具完备，在性能与工艺上均体现出较高水平。古伯察对在南昌及南下途中的乘船体验给予高度评价，他认为相较于中国北方车马的车马出行，南方的乘船出行更为舒适。他特别指出：“中国的交通工具要么累人，要么危险……官船是最佳的出行方式，而且舒适”^[5]。这一评价源于两方面：一是船只的制造与装饰技艺精湛，古伯察赞叹在南昌所乘平底帆船“装备得如此舒适”^[5]，“有装饰奢华、精美整洁的卧室……可谓世间罕见，效果极佳”^[5]，船内装饰奢华、雕刻精美，给他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。明清时期，江西肩负着漕粮供应及运输的重任。不仅造船工艺复杂、难度大，所制造的船只兼具容量大、坚固且耐用的优点^[6]。二是船型丰富多样。古伯察在鄱阳湖观察到，“用途不同，

船型也不同；目的不同，帆式也不同”^[5]。说明当地已能根据不同航运需求制造相应船只，可见江西舟船品类之丰富。

便捷、舒适的水上帆船之旅，为古伯察塑造了深刻的出行记忆。诚然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带来的身心体验会影响行旅者沿途的感受，进而间接影响着行旅者脑海中城市印象图式的构建。因此，乘坐精美官船的经历，无疑成为古伯察将南昌府视为“最像样的城市”的助推剂。

3 古伯察南昌府印象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

19世纪，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已从理想化转为以自身文明为标准的评判。来华者在文化差异乃至对立的背景下，对其所见进行多样解读。古伯察对南昌府的观察与印象，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与中国现实交织中形成的。

3.1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审视与对比

西方对中国的认知，往往映照出其自身的文化视角与时代语境。西方中国形象生成的过程，与不同时期中国国家的实力和地位有关^[8]。古伯察来自法国，18世纪欧洲曾盛行“中国风格”^[9]，但随着“礼仪之争”和马戛尔尼访华，19世纪的西方叙事普遍转向负面，将中国描绘为落后停滞的帝国。多数来华者带着文明优越感，选择性呈现其腐朽一面，强化了这一形象。

古伯察虽身处同一时代，其观察却体现出不同的平衡。他在《中华帝国纪行》中明确批评孟德斯鸠等前人对中国的刻板丑化。“孟德斯鸠用最黑暗的颜色，把中国人描绘成一个可悲的、怯懦的民族，在残酷的专制君主统治下卑躬屈膝”^[5]。他认为认为其描述夸张失实。在行旅中，他既记录社会现象，也注意到中国人的品质，如在翻越险峻的高山时，那些轿夫们却展现出无比的沉着，“却哈哈大笑，讲笑话，讲关语”^[5]。这种相对平实的笔触，使其记述区别于同时代常见的片面批判。

总之，尽管身份、文化与时代背景会深刻影响旅行者的观察与叙述，导致他们的记录常带有主观色彩与文化偏见，但古伯察却在批判与过度美化之间寻求平衡点。即使其旅行承载着西方扩张与传教的时代使命，但他并未陷入简单的文明对立或理想化描绘，而是力求基于实地见闻，在文化差异中寻求客观理解。因此，他的记述超越了对中国单纯的优劣评判，体现出一种在碰撞中追求真实、在差异中保持反思的观察姿态。

3.2 地域分野下的南北差异观察与比较

古伯察的环中国旅行跨越南北，显著的地理与文化

差异同样为其带来了不同的认知体验。在南北交通方面，南方水系发达，舟船成为主要出行工具，古拨叉对其便捷与舒适赞誉有加。“这样的旅行的确是一次逍遥游。你可以完全不受干扰，彻底拥有这份宁静”^[5]，反观北方陆路出行则颇有微词，“人们出行大多取道陆路，可是途中事故频发，常常是车翻人伤”^[5]，认为旅行更为艰辛。这种体验对比，不仅影响其对各城市的印象，也使其将交通工具视为理解地方文化的载体。

古伯察敏锐注意到南北方人的性格与气质差异。

“后者虽然皮肤稍白一些，而且柔弱一点，可是五官却更为清秀，穿着更为考究，此外还更加健谈，更加俏皮”^[5]，“他们皮肤黝黑……充满阳刚之气，这一切与中国南方人形成强烈的反差”^[5]。在他看来，北方人如轿夫般坚韧直率，如“抬肩舆的轿夫是汉人之中最地道的一类人之一”^[10]；南方人灵活、健谈、好讲礼数。这些描述虽带有文化比较的色彩，但是在融入切身经历的基础上所勾勒出来的印象，相较于当时西方常见的刻板评价，显得更为具体与平实。

南北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也体现在他的记述中。西北城市如多伦诺尔被形容为“大片简陋和分布不整齐的住宅区……街道中只会看到污水坑和垃圾堆”^[11]，而南下至邛州一带，则见到“道路变得越来越宽，村庄越来越多，住房建造得越来越好……给人以高度文明的印象”^[10]。这种空间移动中的面貌转换，揭示出当时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。

古伯察通过这些差异性观察，进一步指出欧洲对中国不仅存在描述缺乏真实性的问题，还有“整齐划一”式认知误区^[5]，“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高度统一的”^[12]。他认为，中国并非刻板印象中高度同质的帝国，而是充满地域多样性。其记述既是对南北风貌的真实呈现，也体现了他在整体把握与细节观察中力求客观的立场，从而超越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简单化、片面化的叙述模式。

4 结语

古伯察的环中国旅行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，此时清政府已丧失与西方国家平等对话的地位。相较于当时许多怀抱西方先进文化中心论的来华者，古伯察力求以相对客观的视角呈现中国，并有意识地避免陷入一味赞颂或贬抑的常见倾向。古伯察在南昌府的观察涵盖了交通运输、商业贸易、农业经济与民俗文化等方面，较为客观且真实地反映出明清时期该城的城市风貌、经济发展与水运状况。正如他在书中所指出，“欧洲出

版的很多有关中国的著作……书里所描写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，不过是凭空臆想出来的”^[10]。古伯察强调唯有亲身考察才能接近真实，其记述也因此呈现出更为平衡的图景。对比其他传教士，他并未仅聚焦于中国社会的落后层面，而是以兼具批判与欣赏的态度进行观察，并最终赞誉南昌府为“全中国最像样的城市”。通过古伯察的客观描述，我们既能窥见清代南昌的社会风貌，也可进一步理解19世纪中西接触过程中，一位力图超越文化偏见的外来者所构建的中国形象。

参考文献

- [1]潘玮琳. 19世纪的表述中国之争：以密迪乐对古伯察《中华帝国纪行》的批评个案[J]. 史林, 2010, (04): 141-149+190.
- [2] (法)古伯察. 鞑靼西藏旅行记[M]. 耿昇,译. 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, 2012: 35-37.
- [3]梁洪生, 李平亮. 江西通史清前期卷 9[M].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08: 68.
- [4]赵树贵, 陈晓鸣. 江西通史晚清卷 10[M].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08: 79.
- [5]古伯察. 中华帝国纪行(下)--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 [M]. 南京: 南京出版社, 2006.
- [6]胡迎建. 赣鄱水运文化史 [M]. 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9: 2.
- [7]沈兴敬. 江西内河航运史(古, 近代部分) [M]. 北京: 人民交通出版社, 1991: 103.
- [8]赵凤玲. 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图景——13—20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[J]. 中州学刊, 2022, (12): 141-145.
- [9]沈福伟. 中西文化交流史 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, 1985: 425.
- [10]古伯察. 中华帝国纪行(上)--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 [M]. 南京: 南京出版社, 2006: 8.
- [11] (法)古伯察. 鞑靼西藏旅行记[M]. 耿昇,译. 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, 2012: 42.
- [12]庞希云, 钱林森. 中国万花筒: 古伯察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及其传教士立场 [J]. 华文文学, 2014, (03): 42-48.

作者简介：吴雪（1998—），女，汉族，陕西安康，硕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汉语国际教育，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。